

# 与邓大姐交谈的两个瞬间

汪东林



▲图一



▲图二

人民政协报在1982年邓小平担任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时决定创办。在1982年11月经过两期试刊后,于1983年4月6日正式创刊。同年6月,全国政协换届,邓颖超担任第六届全国政协主席。

由于当时人民政协编辑记者少,都是从其他报刊调进的或新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只有我是在全国政协机关已工作20年,又是参与过报纸筹备创刊全过程的工作人员,因此凡重要活动报道工作均由我带领年轻人参加。

1983年秋天的一次重要座谈会结束之后,主席台广播,让人政协报

总编辑留下,到主席台来一下。正巧因其他事情总编副编都没有到会,我便带着一位老摄影记者邵焱和年轻文字记者邹士方去主席台说明情况,邓大姐对我说:“你们先听,记下来,回去给总编汇报,免得我忘了。”

这张照片(图一)是邓大姐对我讲了加强报社工作四点意见:一是立足统战,面向社会。除了报道政协的工作活

动,还要加强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报道。二是要充分发挥政协委员的作用。要采访他们,约他们写文章,他们是人民政协的主体和生力军。三是加强报社队伍建设,尽快增加有生力量。四是适度加强港台港澳的报道工作。

邓大姐有条不紊地讲,我认真地听。摄影记者抓住了这一镜头,我收藏至今40年,在报刊和我的书中

用过多次。这张照片没有公开发表过,那是邓大姐讲完四点意见后问我,你记得住吗?随行的文字记者即递上记录稿,说我做成了记录。大姐看了一眼,说那就好。摄影记者又抓拍到了这个镜头(图二)。

(本文作者系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人民政协报社原副总编辑)

## 良师益友钱正英

郭裕怀



2022年10月22日钱正英同志因病逝世,享年99岁,走完了她近百年的人生。在8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她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中国的水利、水电事业,数十年如一日,不知疲倦地忘我工作,祖国的大江大河、崇山峻岭、草原荒漠、黄土沟壑,处处都留下了她的足迹。

### 心系大地 造福百姓

钱正英同志离开我们已一年了,她的音容笑貌时常萦绕在我的脑海,她在山西的一言一行频频浮现在我的眼前。

1983年3月我调任山西省分管农业农村工作的副省长。上任后,根据山西的自然资源和实际情况,把开发沙棘作为加速治理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突破口。1984年山西省提出《关于开发利用我省醋柳资源的建议》,经国务院办公厅批复,列入省科研项目,并先后在方山、右玉两县试点。

1985年6月,国家水电部召开了黄河中上游水土保持工作座谈会。在会上,方山县关于开发沙棘资源的材料引起了时任水利部部长钱正英的极大兴趣。会后,她亲自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进行调查,听取了山西省政府和水电部的专门汇报。

同年11月,她在我的陪同下到方山县实地考察沙棘资源的开发利用情况,考察后,她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写了《以开发沙棘资源作为加速黄土高原治理的一个突破口——关于在山西省开发沙棘的调查报告》,胡耀邦批示:“我在好些省都看到沙棘这种灌木植物。它既是一种保持水土的灌木,又是一种可产饮料果子的作物。赞成加以扶助发展。”为贯彻落实批示精神,各级有关部门对开发利用沙棘很快达成了共识。全省曾一度出现了“沙棘热”。

1986年9月5日,钱正英同志到右玉县考察沙棘资源开发利用情况,并确定把右玉列为沙棘资源重点开发区。9月6日,水电部、林业部、山西省人民政府在太原召开第二次全国沙棘资源开发利用经验交流会。钱正英在报告中强调:“沙棘热出现之后,要积极组织沙棘资源的普查工作。坚决反对无组织地盲目开发,严禁乱砍滥伐。为了促进沙棘资源建设,对现有天然沙棘林要进行抚育和更新改造,积极发展人工沙棘林。”

1983年以来,山西省搞小流域治理,每两年开一次工作会议,每次都邀请钱正英同志来,她说:“有言在先,你们的会如果确实能解决问题,我就去;如果是摆样子,开给别人看的,我是不会去的。”1988年钱正英同志离开水利部,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但她还是在1988年、1990年、1992年接连三次参加了会议,每次来参加会议,钱正英同志都要提前进行实地考察调查,认真准备,在会上作重要讲话。1988年作了《户包小流域大有可为——户包小流域贵在坚持》的讲话,1990年作了《坚持推进小流域治理 关键在领

导》的讲话,1992年作了《把小流域治理引向商品经济大道》的讲话。

1994年山西省召开了第五次小流域治理工作会议,钱正英同志因故不能参加会议,特致信表示祝贺。信中写道:“实践证明,凡是经过小流域治理的地区,水土流失的面貌大为改观,生产上升,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因此小流域治理深受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我希望你们将这项利国利民的伟大事业不停顿地开展下去,特别是在新的形势下,希望进一步加强领导,大力发展小流域经济,将小流域治理推向市场,更好地为水土流失地区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服务。”

只要是有利于人民的事,只要不违反原则,钱正英总是有求必应;只要是有利于人民的会,只要时间允许,钱正英总是逢请必到。

### 情牵引黄 福泽三省

1981年,钱正英在听取山西关于引黄入晋工作准备情况的汇报后说:“山西煤多是长,水少是短,不解决水资源问题,怎么能够扬长避短?”钱正英对引黄入晋工程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将引黄工程提上了国家领导人的议事日程,并持续推动立项进程;更重要的是在技术上给予全面大力支持。

在项目论证前期,钱正英牵头组织了两次学术研讨会,第一次会议得出了“引黄入晋,势在必行”的结论,第二次会议进一步论证了“引黄工程,刻不容缓”的判断。两次会议为引黄工程的立项提供了科学依据。

1987年10月,钱正英以专业的维度在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和姚依林副总理提请的报告中阐述道:“要缓和山西省水资源的危机,兴办万家寨引黄工程,势在必行。山西省对该工程已进行了多年前期工作,经水电部两次组织专家讨论,认为是可行的。大家建议尽快按照基建程序,由国家计委组织对设计任务书(或项目建议书)审查后,报国务院审批。”可以说,这是引黄工程正式进入立项程序的开

端。钱正英同志长期关注支持引黄入晋工程,引黄工程距离长、扬程高、跨流域,十分复杂,离开水利部后,她仍多次牵头组织院士和专家从工程的选址、勘察、设计、组织施工,到引进外资、技术和管理经验,全程关注并给予大力支持。

1996年9月,钱正英组织了一批知名专家,对万家寨枢纽和引黄工程工地进行了深入研究。9月16日在太原晋祠宾馆主持召开会议,作了《搞好引黄工程,再创三晋辉煌》的讲话,论述了一系列关于大型水利设施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包括工程质量、工程技术人才、对外交往、体制改革等问题。她说:“这个工程是一个复杂的大型引水工程,在国内堪称第一,在国际上也是没有先例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一定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忧患意识。”“一定要保证做到一次通水成功,长期稳定运行。”在与国外承包商打交道的过程中,要“高效率对高效率,严格性对严格性。”她强调,要完成这样一项巨大而复杂的工程,必须不断探索、不断改革,逐步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环境、与国际惯例接轨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无论在哪方面都凸显出她高度的专业水准和极强的远见能力。

### 心系群众 风清气正

钱正英同志心系群众、清廉俭朴,坚决反对和抵制铺张浪费、不正之风。1988年9月,山西汾阳县遭遇了一次特大洪灾,正在太原开会的钱正英和水利部的同志赶往汾阳县城和重灾乡镇实地考察调研。要求县、省政府对老百姓的经济财产损失进行认真核实,如实上报水利部。我向她汇报说中午省委安排在汾酒厂接待,王茂林书记已经在哪儿等候了。她严肃地说:“怎么吃个午饭,还要去酒厂?”我说:“想让您顺便看看方山县大武酒厂与汾酒厂联合开发研制的新产品玫瑰香沙棘酒。”她说:“也行,但咱们有言在先,中午饭必须是四菜一汤。”

下午视察参观后,汾酒厂厂长常

贵明想让钱正英部长题词,钱正英部长不题,常贵明说:“请部长写个大名留个日期也行”,她也不写。离开酒厂时,看见有人往她车后备箱里放特产,立刻沉下脸来,很生气,工作人员只好全部拿下来。

后面的两天到离石和方山实地考察沙棘资源开发利用工作,在方山考察完后,当地的干部说顺便登北武当山看看,她坚决不去,说:“我是下来工作的,不是下来旅游的。”当天便离开方山前往乡守了。

还有一次,钱正英部长邀请我参观学习三峡工程,到了吃饭时间,当地准备了一桌非常丰盛的酒菜,她大发雷霆,转身就走,毫不顾及身边的部下和专家学者,我从来没见过钱部长如此生气,不管谁违反了她的四菜一汤原则都坚决不留情面。

### 尊重规律 实事求是

钱正英同志是一个对工作认真细致、精益求精、坚持原则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善于思考、与时俱进的人,令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她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一件事情如果有哪一个方面、哪一个局部甚至哪一个细节做得不够完善,她就会感到不安,好像是她自己的过错。

在她担任水利部部长期间,早期主要精力用于三峡大坝等大型水利水电工程,由于国家经济能力的限制,当时没有更多精力和能力在山西搞大的水利工程以解决水资源严重短缺的问题,这使她总是感到有些遗憾,甚至感到抱愧于山西人民。以至于后来她对引黄入晋工程的重视和支持,超乎了我的想象,我想,这正是她造福人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然。

有时我在想,钱正英部长是搞大型水利工程的,怎么会到沙棘资源的开发利用与小流域治理工作那么感兴趣呢?她说:“必须另辟思路,以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相结合”人们的认识要从征服洪水、人定胜天向与洪水共处转变”“对自然环境的总体认识和对策,是制约水利的更高层次的决策”。我想,在钱正英同志的心里,水土保持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课题,像山西这种水土流失严重的黄土高原如何解决水土保持的问题,也就成了她关注的重中之重。

不光对山西是这样,对新疆、宁夏等地方也是如此。她离开水利部后,组织了一个多学科专家组到新疆实地考察塔里木河的情况,为新疆各水系特别是塔里木河的治理提供了科学的决策建议,这是她对新疆的一个交代。在她看来,似乎每个地方都需要有一个交代,她都应该有一个交代,直至交代完她的一生。

钱老生前给予山西的支持和帮助很大,与我在工作中接触较多,很多方面都算是我的良师益友。在我的印象里,她的品德、能力、胆略和作风,都值得我学习和敬仰,而令我最敬佩的,是她对国家、对人民、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敬业精神和奉献精神。

(作者系山西省政协原主席)

## 费孝通助修李公朴故居

周星

费孝通和李公朴是民国历史上两位重要的领导人。他们俩是亲密无间的同志和患难与共的战友,在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特别是在李公朴被国民党反动派特务暗杀身亡后,费孝通、楚图南等第一时间赶到医院凭吊,个个失声痛哭。费孝通还向报界发表了《这是什么世界》,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行径,并表示一定会继承李公朴先生的遗志,将斗争进行到底的决心。

李公朴去世3年后的1949年10月1日,费孝通和其他民盟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一起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李公朴的愿望也终于实现了。但在费孝通的内心深处,始终牵挂着这位同志和战友。

1995年初,李公朴的家乡常州人民为了纪念李公朴殉难50周年,准备修复李公朴故居,从而表达对李公朴的敬仰和怀念。家乡人民把这个想法转达给了李公朴的女婿王健和民盟常州市委,得到了他

们的大力支持。民盟常州市委还专门为这事写信给时任民盟中央主席的费孝通。

费孝通主席很快就回了信,也表示要全力支持。他在信中深情回顾了中共老一辈领导人对李公朴革命的一生的高度评价,指出修复李公朴故居是认真贯彻中央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一起抓的精神。他在信中还强调修复李公朴故居是民盟人的心愿,在修复过程中民盟将责无旁贷、大力协助这项工作尽快完成,争取在李公朴殉难50周年纪念时落成。

在接到费孝通主席的来信后,常州地方政府很快就决定尽力修复李公朴故居,使之成为纪念先烈、教育后代的爱国主义基地。在民盟中央和家乡人民的大力支持下,一年半后,李公朴故居如期开放。当地开展了一系列纪念李公朴的系列教育活动。

如今,李公朴故居已被列为江苏省文保单位、民盟中央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现场教学基地,成为矗立在全民盟盟员和家乡人民心中的一座丰碑。

## 吴冠中的《双燕》

崔鹤同

20世纪80年代初,吴冠中任教工艺美术院期间,带领研究生钟蜀珩到外面写生。一次他们离开舟山回宁波。到宁波火车站,离开车尚有富余的时间,他们便到附近观察。吴冠中被滨河的几间民居吸引,激动了,匆匆画速写。钟蜀珩看看将近开车时间,催他急急奔回车站,路人见他们一男一女一老一少在狂追,以为出了什么事。他们刚踏进车厢,车也就慢慢启动了。

吴冠中画的是河边两间毗连的民居,着力于平面分割,几何形组合,横向的长线及白块与纵向的短黑块之间形成强烈对照。这幅画他称之为《双燕》。

白墙黛瓦、小桥流水、湖泊池塘,白亮亮的水乡。黑、白、灰是江南主调,也是吴冠中作品银灰主调的基石,他艺术道路的起步。银灰调多呈现于阴天,吴冠中

最爱江南的春阴,他的画面中基本排斥阳光与投影,若表现晴日的光亮,也像是朵云遮日那一瞬间。他一辈子断断续续总在画江南,在众多题材的作品中,甚至在他的全部作品中,他认为最突出、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双燕》。

《双燕》明确地表达了东方情思,横与直、黑与白的对比美在《双燕》中获得成功后,便成为长留在他心头的艺术眼目。以后他的名作如1988年的《秋瑾故居》、1996年的《忆江南》,只剩下几条横线与几个黑点,往事渐杳、缠绵纠葛的情结风貌,其实都源于具象形象的发挥。

艺术家灵感的闪现和艺术精品的创作,往往形成于孜孜不倦地追求和瞬间激情的碰撞。《双燕》便是吴冠中艺术征途中的“意外”飞来的“天使”。

## 何其芳与红砂碛

付裕

何其芳的文学成就举世皆知,但鲜有人知他还是一位赏石家。

在长江边长大的何其芳,对三峡石情有独钟。何其芳从小就在长江边的砾滩玩耍,对诗情画意的三峡石爱不释手,拣了不少奇石放在书桌上赏玩,也常馈赠友人。参加革命后,他也常对战友提到家乡的砾滩,讲述石头的美丽。

红砂碛是长江万州河段一个堆满长江卵石砾滩。在长江南岸屏屏南山岭岑公洞下面,沿江有一湾砾滩,夏季长江涨水会淹没砾滩,秋冬春三个季节则水落砾出,彩石斑斓,形如秀眉,故称峨眉滩,也称红砂碛。“峨眉砾滩”是古万州著名的八景之一。

1931年,何其芳和杨吉甫曾在北京

合办过一本期《红砂碛》。知道何其芳的人都知道《红砂碛》,研究何其芳的专家学者无一例外都要提到这本刊物、提到何其芳家乡的砾滩。发刊词《释名》中,何其芳解释了《红砂碛》刊名的由来:“要留住那刹时拣着了,刹时又失掉了的欣悦的影子。”这生动形象地描绘了拣三峡石的情景。

何其芳对家乡的美景魂牵梦绕。1976年4月,何其芳回到家乡,红砂碛美景尽收眼底。何其芳十分专注,每发现一块不错的奇石,总是从不同角度端详、品评。从万州红砂碛带回的三峡石,被安置于他的书桌和床头。家乡红砂碛的三峡石,一直陪伴着何其芳最后的岁月。

## 李文杰与潘序伦的友谊

王荣 王抒滢

李文杰是著名的会计学家、法学家、社会活动家,集律师、会计师、教师于一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证书”第1号的获得者。

潘序伦是中国现代杰出的会计专家和教育家。20世纪20年代后期,他先后创办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和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著有《会计学》《审计学》《高级商业簿记教科书》等,被誉为“中国现代会计之父”。

1940年,潘序伦离开上海赴渝,将上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和学校的工作委托李文杰、钱迺激、李鸿寿、叶朝钧4人负责维持,李文杰为主持人。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上海租界。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留在上海的李文杰与重庆的潘序伦始终保持联系。为维护“立信”的声誉,他拒绝以“立信”之名向日伪政权登记,商定将学校改名为“明信”,“立信”暗号冒险接受关系较深的工商企业委托,通过邮递经由重庆的事务所向国民政府办理公司登记。李文杰改名为李问哲,出任总经理。

在潘序伦去重庆后的4年中,李文杰共为立信招致承办业务794件。抗战

胜利后,潘序伦返回上海。李文杰将“立信”业务交还潘序伦,另自创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李文杰和潘序伦先生私交甚笃。潘序伦先生曾写信给李文杰,“友辈以‘立信人’看您,这是立信和我的无上光荣,记起多次对您说的一句话:‘您为宋江我晁盖。’”正信与立信两家会计师事务所同在一幢楼上办公,两者工作上相互支持,正信事务所还接受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委托的查账业务。

1985年11月8日,潘序伦在上海病逝。李文杰回首与潘序伦合作共事半个世纪的友谊,作挽联悼念:“尽瘁六十年,办学、著书、创业,时刻发扬光大,毋忘宗旨;缔交半世纪,切磋、提携、教导,朝夕观摩仰望,永记铭感。”他撰写的《潘序伦博士创建立信会计事业》在《会计研究》杂志1985年第6期上发表。

1993年,在纪念潘序伦先生诞辰100周年和立信建校65周年之际,李文杰在立信举行的海峡两岸会计事业、会计教育交流会上作诗:“三位一体同步,立信事业兴隆。宗师全心创建,友生协力推崇;著书阐扬财会,育才储备国用。欣逢盛会纪念,高山仰止晋頌!”